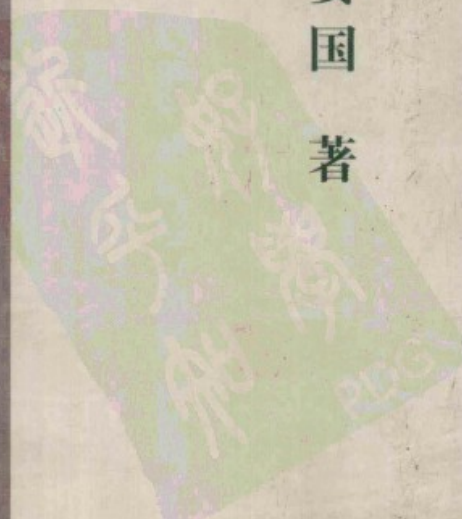


明清苏式家具

濮安国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封面设计 濮安国
版式设计 濮亿一

责任编辑 左亚琳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出版 朱圣学

明清苏式家具 濮安国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葛岭路1号 邮编:310007)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电分制版中心制版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18

字数 130千 图片 530幅

印数 0001-1500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36-307-2/J·126

定价 2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数字水印
PDG

濮安国 著

明清苏式家具

浙江摄影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4
苏式家具的时代背景	9
一、江南经济的极度繁荣	9
二、崇尚奢靡的民情习俗	12
三、精湛卓越的手工技艺	15
四、士人荟萃的文化氛围	18
苏式家具的品种和形制	23
一、椅子	26
二、杌凳	57
三、桌子	65
四、几	89
五、床榻	95
六、橱柜	102
七、屏架	111
八、其他	123
苏式家具的用材和工艺	125
一、苏式家具的用材特点	125
二、苏式家具的木作工艺	133
三、苏式家具的漆作工艺	140
苏式家具的风格及其演变	143
一、典雅的文人氣息	143
二、质朴的乡土风味	151
三、装饰风格的时代性	154
四、苏式与京式和广式	168
彩色图版	175

前言

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期,几千年的传统漆木家具,出现了千纹万华的景象,奇巧精丽的家具漆饰工艺与中国明清漆器一样,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图1、2)。

同时,在这一时期,又产生出了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成就显赫的明式家具和丰富卓越的清式家具。它们都以椴木、花梨木、铁力木、楠木、鹧鸪木、紫檀木、红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具一贯采用的漆饰加工的制作方法,运用木材自身的高雅材质、天然纹理和光润色泽,使家具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意蕴、品位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并以精湛无比的细木工艺,在世界家具艺术史上树起了一座光熠烁目的丰碑。借用一位西方研究人士的话:“中国家具此一伟大艺术”,“自成一格”,“依现代美学观点,它们极致的艺术性、手工、设计、造型及多样变化的款式至今仍深深震撼着人心。”^[1]

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在继承宋元家具传统式样(图3、4)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明入清,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日用居室家具。根据有关文字资料,它起始于被时人称之为“细木家具”^[2]或“小木家伙”^[3]的一种硬木家具。从这一名称还可看到,它与明代民间广泛使用的“银杏金漆”^[4]家具和其他漆饰家具很不相同。

起初,这种“细木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椴木,大约至明代中叶以后,才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鹧鸪等木材。当时人们常把这些花纹美丽的木材称作“文木”^[5]。特别是经过晚明几代文人的倡导和直接参与,这类时兴的新颖家具很快地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显示了经久耐用的实用性和耐人寻味的审美性。从此,细木家具以其出类拔萃的形象风貌,成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史中一颗无比灿烂的艺术明珠。因为这种家具形成于明代,时代特色鲜明,故称其为“明式”。

明式家具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家具实物中都不难看到,这一地区是孕育产生明式家具的故乡和发源地,也是长期生产明式家具的主要产地。直至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的生产尽管已遍布全国不少区域,但惟有苏州地区的产品最能表现明式的风格特质,最具有江南文化的底蕴。基于明式家具别具一格的地方色彩以及江南民间木制家具所呈现的共同风貌,人们又称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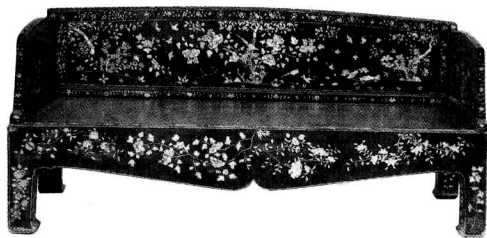


图1 明黑漆嵌螺钿三屏榻,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1 竹木牙角器》



图2 明宣德剔红三屉供桌,英国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克雷格·克拉纳斯《中国家具》

“苏式家具”，或称“苏做”，一直将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

1980年，笔者曾发表《试论“明式”和“苏式”家具》^[6]一文，第一次论述了苏式家具与明式家具的特殊关系，阐说了产生苏式家具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高逸”、“遁纯”、“典雅”的文人氣息和艺术风格，提出了“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这一观点。

明末至清代早期，苏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传至今的许多优秀的明式家具实物，其实很多就是苏州地区清代早期生产的。后来随着社会的演变，又有许多新颖的苏式家具出现，其中不少品种和造型还被人们说成是“明式”的所谓“变体”。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苏式家具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清式家具的影响，这时大量生产的苏式家具表现出了新的特征。然而，它们与当时全国盛行的广式家具和京式家具仍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差异，依旧继承着传统的工艺和做法，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在清代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中独树一帜。至清代晚期，随着传统家具的衰败没落，各地的家具生产都殊途同归，苏式家具也结束了它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最光辉的岁月。

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众多的明清苏式家具，有代表明式家具精华的，也有反映清代家具类型的。在所有的家具流派中，惟有苏式家具能如此自始至终地体现明清家具的最高水平，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苏式家具无愧是中国古代家具黄金时期独领天下风骚的杰出典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家具，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生活方式的反映。苏式家具这一文化现象，与明清社会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和各种人文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处吴文化中心的苏州地区，两宋以后，已成为江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尤其在经济上，是全国商业最兴旺、交通最发达、城镇最繁华、手工业特别密集的地区。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积聚和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各个阶层对于日常居室生活中的各种物品都有着更多的追求，从而促使苏式家具的生产获得重大的发展。在纤柔灵秀的江南水乡，崇尚怡然自得的民情和风俗，往往使人们的衣食住行更注重个性追求，苏式家具也被浸润在这种氛围之中，并以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登上了时代的高峰。

家具，更是一种艺术，当人们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就会更高地追求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故苏式家具的形制、式样、色调和装饰纹样等等，与吴地的诗歌、小说、戏曲、书法、绘画、建筑、园林等各类艺术



图3 宋《无款文会图》中的案桌和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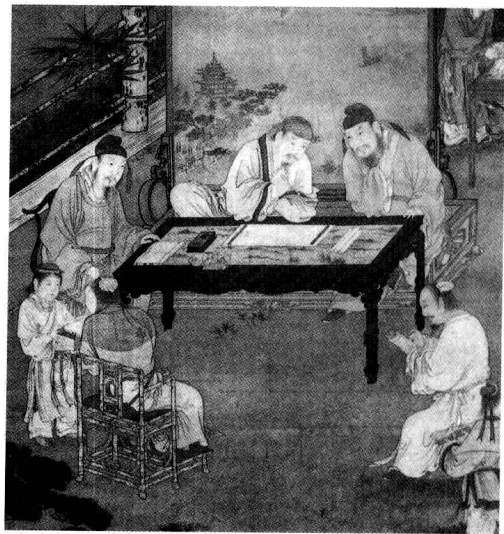


图4 传宋人《十八学士图》中的桌、椅和屏风

形式一样，也都成为江南文人学士们施展才华的领域，他们的爱好、文艺修养和美学主张，直接地在苏式家具中被鲜明地凸现出来，成为时尚的滥觞。无论是书斋的文椅和画桌，还是厅堂的几、案、屏、榻，均反映出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韵味。我们如果把明清两代的漆饰家具比作中国绘画中五色斑斓的工笔重彩，那么，以硬木为主要用材，运用细木工艺制造的苏式家具，就似淡墨轻染的白描；如果说清代京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犹如宫廷建筑与西式洋楼，那么，苏式家具就像江南民间的粉墙黛瓦。当然，苏式家具的艺术成就不是可用这种简单的比喻所能概括的，但从这里，或许也能体会到它别具一格的艺术价值。它与中国古代艺术史上许多艺术类型一样，已成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文化标志。

通过以上概说，我们可以认识到，苏式家具是研究明清家具不可缺少的重大课题，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明式和清式家具，就不能不对苏式家具首先作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

我于1964年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工作分配来到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古城，一瞬间，已三十多年过去了。70年代的风风雨雨，把我从机关下放到厂矿接受再教育，去了一家生产红木家具的工厂，从此与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提高出口传统家具的设计水平，为了帮助工厂培养家具设计人员，我千方百计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当时，只看到1944年北京出版的G.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图版和朱家溍先生在《文物》1959年第6期上发表的《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的文章。我将全文抄录后，把文中的附图也一一描绘下来。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到江浙皖各地作深入考察，对明清家具的实物资料或测绘，或拍摄相片，进行采访、收集和整理。

我要十分感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吴劳、尚爱松等几位工艺美术教育界的老前辈。“文革”后期，他们来苏州考察工艺美术恢复生产的情况，看到我在工厂培养青年学徒学习传统家具设计，鼓励我重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工作。他们返校后，还将一套馆藏明式家具的黑白照片资料寄来给我参考，使我受益匪浅。

此后不久，我赴北京考察，参观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硬木家具厂和故宫、颐和园等单位珍藏的明清家具实物，拜访了我国较早研究明清传统家具的老专家杨耀先生。杨耀先生待人热情，殷切希望年轻一代努力继承和发扬家具的民族传统。我还曾得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工艺美术家徐绍青画师的指点。他常常告诉我收藏于民间的一些古旧家具，有

时我们还一起去作鉴赏和拍摄实物照片。原苏州市工艺美术局刘玉昆先生鼓励我写出了第一篇家具学术论文，在参加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成立大会时作专题讲座，并在母校的院刊上公开发表，这就是上文提到的《试论“明式”和“苏式”家具》。后又参加1981年7月4日至10日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江西庐山举办的特种工艺学术交流讲座，会上作了专题讲演，放映了近百张幻灯片。

1980年调离工厂后，苏式家具仍一直是我工艺美术史论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先后又发表论文十多篇。近年来有《中国红木家具》、《明清家具》和《明式家具》等著作出版。

自1985年后，国内、国外对明清家具的研究不断取得成果，一批学术性著作陆续出版发行，使明清家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间出现了不少收藏明清家具的爱好者和收藏家。同时，接二连三的古旧家具拍卖会又常常引发文化市场的热潮，激发了人们对民族传统家具的反思，使各方面对明清家具更加关注和珍惜。但是，由于有些活动和研究总是受到各式各样商业行为的干扰，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学术性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导致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结论，甚至为了商品的价位和经济目的，弄虚作假，骗买倒卖，使圣洁的文物和学术领域同样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我在著作中，全力排除这方面的干扰，坚持求实的作风。因此，若在阐述中与他人的观点和意见不吻合，决不是想去针对某一个人，希望得到谅解。为了说明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引证使用一些出版物中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这在书中都一一作了注明，并在此向有关作者和出版者致谢。同时对提供给我照片或资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以及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的各方面朋友，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濮安国

1998年7月于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

注 释：

[1] 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图录》(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1996年出版)。

[2] 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3]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4] 同 [2]。

[5] 明文震亨《长物志》。

[6] 《南艺学报》1981年第1期。

苏式家具的时代背景

一、江南经济的极度繁荣

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山清水秀，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风物清嘉，是一个具有共同人文特点的自然区域。苏式家具的产生，首先得益于这一地区长期繁荣的经济。

早在隋唐时期，江南农业生机勃勃，耕作技术大有改进，已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北宋时，风调雨顺的太湖流域，物产丰富，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史籍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天下赋税江南居十九”的记载。“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1]这时，商业贸易开始逐渐兴旺。时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述苏州说：“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郭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又说：“吴郡余杭，以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2]故素有“天堂”的美誉。此后，江南经济在全国一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到南宋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并由农村经济逐渐向城镇商业经济转换。如全国的丝织品生产和贸易，已逐渐云集江南。苏州府辖的震泽镇、盛泽镇，嘉兴府辖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辖的双林镇、菱湖镇等，都已成为丝绸集散和精造技术的中心，出现了所谓“吴织衣天下”的昌盛境况。“富于中原”的江南经济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原有布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迅速发展起来的城镇商业和贸易，加快了江南地区社会财富的聚集，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富饶的景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具体地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情况：苏州“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有十六个富庶的大城市和城镇属于苏州的管辖范围，这里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在描述有“天城”之

图5 《南都繁会图卷》中描绘的明代后期南京商业盛况





图6 明人绘杭州《北关晚市图》中的贸易场面

称的杭州时说：由于“出产大量的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罗，遍体锦绣”。又说“杭州人民的住宅，建筑华丽，雕梁画栋。他们对于这种装饰、画图以及富有想像力的建筑物，表现了极大的爱好。所以，在这方面耗费的钱财，是极其可观的”^[3]。

明初时虽一度发生过经济衰退，但很快又得到恢复和继续迅猛发展，并出现了一个全面上升的局面。以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南京、松江、嘉兴、湖州等城市为主体的江南城镇经济，更是日新月异，一派欣欣向荣（图5、6）。如嘉兴府的一个小镇王江泾，由于“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而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不从此经过……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4]，使其能获丝绵之利，昌达兴旺，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一个新兴市镇。

成化（1465—1487）年间，苏州更是“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集列，桥梁栉比……财货所居，珍异所聚”之地。此时，行人如流潮，居货积山高，呈现出一派“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5]的景象。

明人王骥在《吴中繁华》中曾生动地描绘当时苏州城的盛况：“阊阖辐辏，绰契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丛盖，壶觞掣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采耀目；游山之舫，载伎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至明中叶之际，地处江南腹地的苏州，早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图7、8）。吴门著名画家唐寅在其《阊门即事》诗中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来自各地的富商巨贾，操着不同的乡音，如此通宵达旦地作巨额交易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当时江南商业繁茂、贸易兴旺、经济发达的生动写照。像这一类记载，在文献史料中比比皆是。

到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其名为府，实际上已完全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会”^[6]。数以百计的江南城镇星罗棋布般地分布在苏州邻近县

内，向四周辐射，在几百里方圆的范围，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市场网络，形成了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具有共同特色的区域经济。

在这里，传统经济开始向着近代经济转型，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布，社会观念和思想意识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所谓近代文明的肇端，凭借富余充足的经济基础，很快地出现在江南这片土地上，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在这里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各种文化现象，丰富多彩，犹如联动的锁链，互相影响，一起谱写出了气势磅礴的时代乐章。苏式家具在这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中，也成为一种代表，一支美妙无比的乐曲。

关于当时家具生产贸易的情况，史料中很少见有具体的记载，但从有关文字中仍可以发现一些与当时繁荣经济同步发展的情景。如冯梦龙在其小说《醒世恒言》第二十卷中写了一个专做细木的家具店。这个名叫张权的店主，原籍是江西南昌进贤县人，从小在家乡跟隔壁邻居徽州小木匠学得木工手艺，后“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一爿家具店，还“自起了个别号，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十多年中他一直“生意顺溜”。由于他的家具做得十分精致、坚固，“比别家不同”，故在有一年遇到荒灾一筹莫展的时候，又被专诸巷内天库前一个“开玉器铺的王家”请回家中做了一年多的活，既有成套的“嫁妆”家具，也有许多日常使用的“桌椅书橱”等。从小说中描述的这段内容不难看出，隆万（1567-1620）年间，苏州细木工家具的生产已十分普及、兴盛；行业中采用时兴的广告媒体，招徕顾客，相互竞争。从其他方面的材料还可以知道，由于苏州家具产业的市场广大，安徽、江西等许多外籍匠人也皆汇集吴地，相互交流，对苏州家具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种情形，我们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也能形象地看到。如一幅佚名的明人风俗画《上元灯彩图》，描绘了晚明时南京内桥一带的市肆贸易活动。这是一个货物琳琅满目、人来人往、热闹繁华的古物市场，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家具，“品种有架子床、罗汉床、几、案、桌、凳、架、箱、花台、扞屏、鼓墩、根椅、帽椅、圈椅、躺椅等等”，有的家具“像是紫檀制作，并镶嵌大理石”^[7]。画中的家具



图7 明袁尚统绘《晓关舟楫图》中的明代晚期苏州贸易盛况



图8 明刊《金瓶梅》木刻插图中的绸缎铺

交易场面足以证明,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极度高涨,硬木家具至晚明时期已在江南各地大量生产和流行,工艺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二、崇尚奢靡的民情习俗

江南繁荣的商业经济和城镇市场贸易,促使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起来。人们在富足之余,追求各方面享乐,已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向。所谓“君子喻于义”的传统观念已不再束缚人们的行为。社会开始提倡“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之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8]的利欲价值观。这正是明代中叶以后风情民俗中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

从此,江南地区奢靡之风越来越盛行,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玩乐纷纷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很快朝着一种开放之势推进。正嘉(1506-1566)年间,“吴下风俗,大率以利相间,鲜尚奇节”。至明后期,“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9]。且“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故吴地风俗,处处出现“富贵争胜,贫民尤效”^[10]的风气。史籍还有苏州“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11]的记载。《松窗梦语》又有“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的描述。可见,正是这种追求享受的奢侈之风,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渐渐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审美意识。

不难想见,与人们日常起居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具,随着社会时尚的变化也格外考究起来。明人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记载说:“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这说明,素重婚嫁习俗财奁的江南地区,这时对家具和嫁妆等器用,已经到了“既期贵重,又求精工”的地步。

而“纨绔豪奢”之家，每每“又以楮木不足贵，凡床榻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追求高级家具，更成为一种奢靡的时尚。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吴中奢侈风行的民情对苏式家具的发展所起到的直接推动作用。人们对生活日用器具新的审美需要和向往，使家具已由“银杏金漆”发展到“皆用细器”，从“以楮木不足贵”，发展到“凡床榻几桌”，皆用花梨等贵重木材，甚至“动费万钱”的程度。这样的变化过程，恰恰是中国家具史上一代家具的变革发展过程。时人将花梨木、铁力木、乌木、鹵鹑木、紫檀木等优质硬木材料制作的高级家具，已看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明王士性《广志绎》中亦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这种追求紫檀、花梨和尚古的风尚，不仅成为江南奢靡之风的特色，也是吴地美学情趣的重要特征(图9)，是孕育形成苏式家具风格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人张茂实记隆庆四年(1570)三月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时写

图9 明《杜荅玩古图》中的凳、椅、案桌和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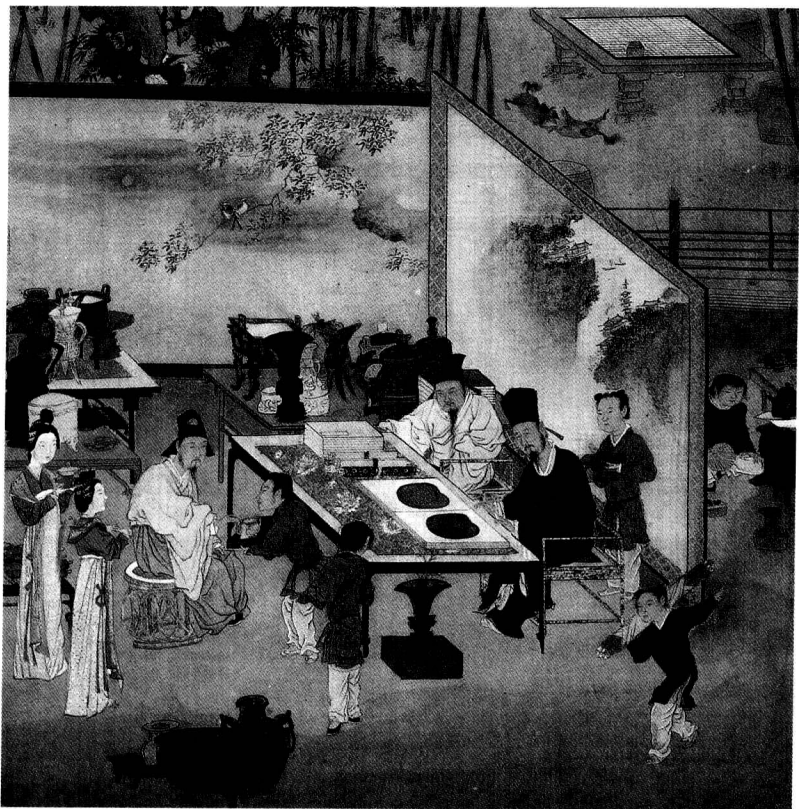


图10 明仇英绘《竹庭玩古图》中的椅、桌、屏风

道：“一出文王方鼎，颜真卿《裴将军》诗；一出秦蟠螭尔玺，顾恺之《女史箴》，祖母绿一枚，《淳化阁帖》；一出王逸少《此事帖》，龙角簪一枚，官窑葱管脚鼎；一出郭忠恕《明皇避暑宫殿图》，白玉古琴，李廷珪墨二饼……”这些古玩文物都需要几座之属和家具陈设(图10)。姑苏这种“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炉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冻石，装潢卷轴必仿宣和”^[12]的斗富争胜，正是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这种风气对江南居室文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有社会名流与官宦争购收藏一件铁力木天然几的逸事，从中可以感受到明代晚期人们企求高品位细木家具的时尚和风气。该书卷六记“仲叔古董”云：“葆生叔少从谓阳游，遂精赏鉴。得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匝，项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辞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铁梨木天然几，长丈六，阔三尺，滑泽坚润，非常理，淮抚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维遽去。淮抚大恚怒，差兵蹙之，不及而返。”

联系前文提到《上元灯彩图》市肆贸易中陈列家具的景况，使我们不难看到，是明代江南崇尚古风和奢靡的民俗，给苏式家具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三、精湛卓越的手工技艺

宋元以后，苏州一直是全国手工业最密集的地区。明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高度积聚，消费水平的极大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商贸与手工业的竞相争艳，更使吴地的“雕、镂、涂、漆，必殚精巧”。《吴县志》记载：“苏州城中，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手工业中，除了数以千计的机户专门从事织造以外，各行各业，名目繁多，产品各异，技术精良，全国各大城市无一可以比拟。明代苏州一地，突出的著名手工艺行业有：

玉雕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装裱 史籍记载，苏州装裱在宋代就已盛名全国，到明代，更以“苏裱”闻名遐迩。世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的赞誉。周嘉胄《装潢志》也说：“装潢能事普天下，独逊吴中。”

铜作 元代苏州已有仿铸古铜器的记载。明初木渎王家，所制香球及锁皆精巧。更有蔡姓铸匠，自成一派，称“苏铸”，仿宣德炉真假难辨，堪称一绝。清《乾隆府志》载：“郡中西城，业铜作者不下数千家，精粗巨细，日用之物无不具。”

窑作 出陆墓、齐门，专事烧造方砖，以坚细最具特色。故“工部光作，多出烧造”。清代称“金砖”，又称“坚砖”，是砖雕的好材料。砖雕技艺被称作“吴帮”，将透雕、浮雕、线刻和悬雕等综合运用，名震四方(图11、12)。

刺绣 吴县系丝绸之乡，刺绣历史悠久，技艺精美。明王鏊《姑苏志》云：“精细雅洁称苏州绣。”可见很早就已形成鲜明的地方风格。

织席 以虎丘最佳，其次出浒墅关。织成花草人物为帘或坐席，品类齐全。

藤作 治藤为之，作坊大多在齐门一带。



图11 明建筑砖雕麒麟纹
(上海松江城隍庙照壁)



图12 清康熙(1662-1722)年间建筑门楼的砖雕
“状元游街”(苏州东花桥巷中和里汪宅)